

中国经济运行丛书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

李贺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经济运行丛书》总序

李 京 文

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就是近5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近期中国经济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个“奇迹”，对中国经济近20年的快速、稳定发展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例如，这个发展进程有些什么特点，它的运行机理是什么？如何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运行？中国生产率增长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保证中国经济运行有什么贡献？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难点何在？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数量经济、技术经济、区域经济等经济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经济运行有什么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策取向是什么？中国应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21世纪的中国经济如何展望？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经济学工作者、企业家、各级领导干部与管理人员，以及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套《中国经济运行丛书》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回答而组织编写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世纪之交推出的这套《中国经济运行丛书》，经过了有关专家的精心策划、精心选题、精心安排，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为丛书作者，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争取成为中国经济类图书的样本。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套丛书之所以值得一读，我以为其原因就在于它将具有三大特点：科学性和先进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应用性和启示性。

首先，这套丛书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优秀中青年学者的创作或合作产物，代表了当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他们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继承性与开拓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如实地评价过去，科学地展示未来，提出新观念和新思想，构造新模型和运用新方法，使各有关课题研究处于国内或国际的领先地位，具有较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如《知识经济的兴起》、《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等。

其次，这套丛书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对经济增长趋势、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支柱产业选择、人力资源和就业结构、消费和需求结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等，都有全面、深入、精辟的论述，既有系统的、权威的数学模型，又有详尽的统计资料和典型数据，在总量层次、部门（产业）层次、地区层次等各个层面都可为进一步跟踪研究和拓宽研究范围提供帮助。如《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

最后，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贡献力量，因此必然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建议，特别是始终强调科教兴国的基

本国策，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套丛书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和应用问题，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帮助和启示。

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2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丰厚献礼，也是对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促进，同时也是对不断变革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科学宝库的一个补充与丰富。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而且这套丛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其中很多因素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作者和出版者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在此真诚期望各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使这套丛书不断修正、补充、完善。

1998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一节 确定本书选题的思考	1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角度划定	7
第四节 分析框架及体系结构	11
第二章 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	14
第一节 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意义	14
第二节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历史回顾	20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位基准	28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34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比较优势	39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及新发展	3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48
第三节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提出	60

第四节	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概念的论争评析.....	65
第五节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类型定义.....	68
第六节	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	73
第七节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优势	80
第四章	体制偏好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驱动	85
第一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85
第二节	“二元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追溯及其基本特征.....	89
第三节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现象描述	93
第四节	宏观经济中的数量扩张冲动的体制探源.....	97
第五节	中央、地方新的利益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99
第六节	外部压力派生的体制偏好.....	102
第五章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代价	106
第一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代价.....	106
第二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113
第三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与国有企业的困难	117
第四节	粗放型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121
第六章	体制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步转变	127
第一节	体制变迁的几点理论思考.....	127
第二节	改革是体制创新而不是社会制度创新	131
第三节	体制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再考察	135

第四节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旧体制复归.....	138
第五节	改革、稳定、发展关系的考证.....	141
第七章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行选择.....	147
第一节	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大难点.....	147
第二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的 两难突破.....	156
第三节	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转变战略.....	159
第四节	资本密集投入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可行选择...	161
主要参考文献	167
后 记	171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确定本书选题的思考

知识经济时代的悄然兴起，又使人们想起了一个差不多被遗忘的课题：中国还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本书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作为书名，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指出，要在未来的15年时间里，实现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更是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一步。但是，作为规划，只能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它没有告诉人们为何这样。在这方面，传统经济学又缺少动态特征分析和系统的对策研究，对改革过程中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习惯于通过制定规划来表达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上又“笼而统之”，不少人误以为只要选准了目标和方向，改革就大功告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自然实现了，致使在“障碍物”面前常常束手无策，陷于被动状态。国有企业的改革难以突破就是突出的实例。国外的改革实践和经济发展的后果，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经验

教训提醒我们，选准方向确定目标仅仅是一项事业的开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义的认识应该说是清楚的，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转变”，这正是经济学在理论上应该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划分，根本的差别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研究，属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大都侧重经济增长因素方面的分析。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时，某些学者虽有个别、局部的现象描述，也不时地闪烁出耀眼的火花，但缺乏深入的、规律性的探讨，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研究，几乎是无人问津。因此，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追溯起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张在中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一直是实践中困惑难解的课题。不仅中国人民、中国政府领导和中国经济学家普遍重视，而且也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关注。特别是新近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后，在我国理论界，此类问题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似乎后来者再无话可说。但我发现：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体制转型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探索的论著则为数不多，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还缺乏深入的挖掘。经过一段短暂的热烈讨论之后，现在研究的热情又渐渐地冷却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哪里切入？选择什么路径？采取什么方法？怎么处理“两个转变”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共同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若能从宏观上加以动态描述和理论概括，并与国外的情况加以适当比较，这会成为对“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有益探索。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试图重点突破中国在资源紧张、资金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分析，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实际运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等；另一部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应用研究，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矛盾与对策主张等。这两部分研究的时空界定就是中国198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和体制变迁过程。现在，国内部分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过渡时期”，盛洪、林毅夫等同志还编写了《中国过渡经济学》。在本书中，我没有采用这一提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俄国的布哈林还曾有过“过渡时期的经济学”（指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的经济学）。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过渡时期”的概念过于宽泛，容易出现混乱，也没有必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中国体制转型时期”更为准确和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

本书对目前能收集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与此同时，对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分析的文献进行了研究，而且汲取了其中的精华。但总的感觉，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学者是一个意见相左的群体，在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侧重和倾向。

一种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借用T·W·舒尔茨的批评，“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

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从现在研究的进展情况来看，大体有两种现象：一是把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省略。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衡量经济增长与否，从而忽略了体制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动态之间关系的研究和分析。二是把体制的转变看作是给定的前提条件。诺思教授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中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这方面的现象，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一定的表现。有的文章提及到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忽视了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一文中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钟贤宾认为，“抓住了科学技术，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史清琪把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决策部门，把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问题，认为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科技兴县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了。

另一种倾向是“制度决定论”。长期以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热烈而持久的讨论。1957年，索洛在其《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部归结为由技术创新而取得的技术进步提供的。到了6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单凭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

[美] 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等：《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第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学术月刊》1996年第8期。

《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5年第5/6期。

长率，认为技术创新难以解释的部分实际上是由制度创新完成的。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还把这种解释自豪地称之为：“美国经济史中进行着的一场革命。”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形成了制度学派，出现了“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者的研究在中国也有两种现象：一是拘泥于“制度经济学”的空洞演绎。“两个转变”是发生在中国或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事物，但在实际分析中，缺少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专门概念或专用术语，“现实与理论的比率太低”，缺少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更没有经济理论来指导分析。二是夸大制度变迁的作用，很多学者把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归咎于计划经济体制，似乎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转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上来了，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现状，忽视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

“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不适当地强调技术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均有片面性。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在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技术决定制度，这是早已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尽管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上可能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制度选择，但制度选择的空间总要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但是，“技术决定论”的政策含义并不在于此，而是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在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尽管主观上没有把技术进步与体制改革对立起来的意愿，但客观上则把技术进步与体制改革对立起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技术的演进有其自身规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长

Douglass C. Nor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III, No. 1, Part 1 (1963)。

期的过程，按“技术决定论”推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靠其自然发展就可以了，政府的政策推动只能局限在科技进步方面。与“技术决定论”相比，“制度决定论”更是“人多势众”，几乎成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唯一的认识工具。“制度决定论”坚持制度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优先：不是技术变化决定制度变化，而是制度变化决定技术变化。毫无疑问，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因素的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处在体制转型时期的我国尤其如此。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制度选择可能会优先于技术变化。比如，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延缓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并不为过。但是，倘若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体制转变上，则良好的愿望也未必会引发出正确的主张。“一包就灵”、“一鼓就灵”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既有技术进步因素的制约，也有体制因素的影响。这也正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之处。因此，仅从“技术”或“制度”哪一个方面去分析，都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在经济发展阶段与体制的综合作用中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舍此，均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还会陷入“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无谓争论之中。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是推论出来的理论前提，它将在后面的研究中得到实践的证实。

本书的研究将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许多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具体问题都给出答案，最终探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而在于构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环境。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相比，具有某些独特的表现。这些特殊性并没有掩盖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规律，因为它们反映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共同的客观要求。找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殊性，并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国际比

较，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点、变动的认识，攻克转变的难点，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角度划定

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要涉及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效益、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内容。本书在分析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两个基本方法：

一是运用理论抽象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的政府做出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发生在中国的特定事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际运行，只有加以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才能形成较为确切的认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才得以合理展开。在整个研究中，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些较新的分析方法，并对其内容作了简要概述，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些分析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进一步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研究过程中，有的问题先从概念入手，然后分析具体的经济现象；有的问题先从实证分析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从逻辑演绎到逻辑结论，就很难提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本书力图把理论抽象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比如，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既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又注意研究划分经济阶段的一般标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既进行实证描述，又从中找出经济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二是运用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比较分析

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方式都有过论述，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增长模型大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范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中也要遵循。应该承认，世界上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有一批硕果颇丰的专家和学者，而且有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相当的深度。其中在我国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还有舒尔茨、诺思等人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当中，不乏一些科学的成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计量方面的知识和经过实践检验后筛选出的说服力强的资料。有些认识工具可以直接为我所用。当然，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和经济水平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复杂，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理论假设必须修正。综合比较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运行规律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包括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和国内国际的比较分析，由此得出若干新的认识或结论。

服从于本书探索中国体制转型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的要旨，根据上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通过3个角度的分析展开：

第一，分析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影响，揭示一定历史阶段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目前，世界上许多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正在由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过渡。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还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共生的现象？研究证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而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除了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因素制约外，还受经济体制的影响。经济体制主

要通过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主体行为模式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运行目标的机制不同，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也存在差别，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必须将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联系起来，研究二者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第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矛盾的矛盾，揭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结果。但是，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既可能出现“有增长有发展”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八五”期间年平均达到8%以上，在世界上是较高的，但经济发展的水平则没有以同样速度提高，出现了资源紧张，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经济效益低等现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不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是低消耗、高质量、高效益。因此，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去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

第三，分析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二元体制”并存的矛盾，揭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运行特点。如果从80年代初算起，到2010年，“二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我国将持续30年的时间。迄今为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先例。原苏联采取“休克疗法”，在暂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两种体制胶着并存，“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同时存在，使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又有不同于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初期的许多特点。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

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缓归结为市场经济没有完全放开。本书的研究将证明，这种观点是从把“计划经济当作万恶之源”的前提出发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看过过去30多年的发展，更要看最近10多年的实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原因，既有传统体制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负面效应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应用研究方面，本书试图突破以下几个难点：

第一，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转变增长方式必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劳动力的使用相对减少，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理论上必须解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否一定带来劳动力的过剩？需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要正确处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产业的关系。

第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技术比较先进，资金比较充足，劳动力素质比较好，管理水平也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劳动力素质较差，管理水平也比较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更有条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又是一大矛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区域性任务而是全局战略，不可能东部“转”，中西部不“转”，或者发达地区先“转”，落后地区后“转”。因此，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契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也是一个时代性的经济学课题。

第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中国目前的资金短缺，研究与开发经费很少。在理论上要克服增加投入就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错误认识，同时要在实践上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